

敦煌石窟中的景教遗存述略*

李博雅

摘要:敦煌多民族聚居与多元文化交流,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曾长期并存。其中,敦煌莫高窟确切出土的景教遗物共有12件,其中绢画1幅,铜十字架1枚,文献10件。在10件景教文献中,有汉文6件,叙利亚文2件,粟特—突厥文1件,粟特文1件。此外,其他非景教汉文、回鹘文和藏文文献以及《莫高窟六字真言碣》、《重修皇庆寺记》中亦留存有基督教的信息。研究敦煌文物中的景教遗存,对于了解我国西部历史上的多元文化交流史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 多元文化 景教遗存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Nestorius)创立,故又称“聂斯脱里派”。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曰:“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①景教传入我国时曾一度在长安兴盛,由于唐朝宽松的宗教政策,在唐初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全国建“十字寺”,其信奉者多为非汉族民众。唐末五代至北宋,景教在中国内地几乎绝迹,而在一些西部地区仍有景教信仰者^②。敦煌地接西域,华戎交错,同属边陲,景教同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8XKG008)“敦煌石窟历代游人题记调查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② 伊犁地方与七河(Zhetysu或Semiryetodie),原为中国领土,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后,除伊犁以外的七河地区被割让给俄罗斯。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七河地区划属哈萨克斯坦。两地四个景教墓地遗存景教墓碑甚多。

样有传播，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景教文献，在唐代景教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记载：“门徒弟子言归依佛者，归依何佛？且不是磨（摩）尼佛，又不是波斯佛，亦不是火袄佛，乃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且如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此间则有波斯、摩尼、火袄、哭神之辈，皆言我已出家，永离生死，并是虚诞，欺谩人天。唯有释迦弟子是其出家，堪受人天广大供养，称佛名。”^①文中的“波斯佛”即景教。敦煌的景教遗存，除保存在敦煌文献中外，在敦煌绘画中同样有迹可循。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绢画stein painting48.ch.xlix.001景教人物，属敦煌乃至我国中古时期景教传播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其中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中新发现的铜十字架和叙利亚文《圣经》，景教铜十字架性质、图案特征等资料十分珍贵，保留了多元文化信息。

一、唐代敦煌景教绘画

传世的唐代景教人物绘画现今仅残存一幅，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获得，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

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这幅绢本着色画像与中国古代菩萨像几乎一致，头后有光轮，身披纱衣，左手持杖，右手呈莲花指状。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怀疑此画是地藏菩萨像（Ksitigarbha）。韦礼（Arthur Waley）称此画像原为景教之物，不过敦煌却视作菩萨崇拜^②。松本荣一将此画定作“景教人物图”^③。羽田亨就此画云：“敦煌出土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1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1页。

② A. Waley, *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 (London: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and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1931), pp.81-82.

③ [日]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昭和十二年（1937）刊印。

应为基督画像的绢画断片……大概为敦煌地方唐代画家接受景教司祭或教徒的订货，按其意旨或其他参考材料画成。”^①有“景教博士”之称的佐伯好郎亦主张此像乃景教的耶稣像。

也有学者怀疑该画像为摩尼教的绘画，但此画中人物穿红褐色衣服，与一般穿白色服装的摩尼教人物显然不同。

根据绢画残片修复的基督像线图中有三个十字架，一个绣在对称的王冠羽翼的正中，一个悬挂在靠近胸部的项圈正下方，一个立在拐杖的顶端。《至顺镇江志》卷九“大兴国寺”中抄录有儒学教授梁相所撰描述聂思脱里教寺院的十字架是景教徒的标志时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②画中人物佩戴十字徽的方式与《大兴国寺记》所记载十字“冠于首、佩于胸”完全一致，可见该画属景教遗物无疑。

从十字架的形制来看，“画中的十字架既不属于拉丁十字形，也不属于罗马十字形，而是属于“马耳他十字形”（Malese Cross）纹饰。这类十字形之状貌，四臂等长但不等宽，四臂末端较宽，自末端向中间逐渐内收。”^③

从原图来看，画中人物非汉人，胡子和颚须都是红褐色，戴着波斯式带翼王冠。据林梅村教授和匈牙利罗兰大学宋妮雅（Szonja Andrea Buslig）博士的研究，认为这幅基督画像在很多方面都刻意模仿波斯萨珊王朝时代的塔奇布伊·博斯坦（Taq-i Bustan）之萨珊波斯神像石雕。比如两者都有头光，佩戴类似项圈，甚至两个神像的基本姿势都非常相似。圣教像人物佩戴有十字莲花装饰的头冠以及坠有十字架的项圈，头冠和项圈上的十字架边缘为水滴状，而十字莲花这种符号亦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此推断，这幅基督像很可能是以波斯宣教士阿罗本（Alopen）带至长安的圣像为底本摹绘的。

① [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京都：弘文堂书房，昭和六年（1931）发行。

② [元]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清同治二年（1863）刊影印本，第8—9页。

③ 包兆会：《唐代敦煌景教绢画》，《天风》，2018年第4期，第45页。

敦煌景教绢画的基督像明确受到佛教绘画影响，比如画中人物的姿态可能受到菩萨施法印姿态的影响，画中两手指拈花的姿势与敦煌的菩萨和供养人的姿势也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敦煌景教绘画很有可能受到了唐代佛教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成为多元文化聚集、交汇、融合之精粹。

总之，敦煌景教圣像绢画是景教传教的产物，它体现了波斯艺术、佛教艺术和基督教艺术的融合，在体现其本身宗教内涵之外，亦反映了景教应有的时代特征与所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信息。景教绢画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物证。

二、敦煌考古发现的景教遗物

景教十字纹牌饰为青铜铸造，直径6.6厘米，1988年出土于莫高窟北区B105窟，敦煌研究院编号B105: 2。该牌饰以十字架为骨干，十字置于一圆环中央，十字架各端均伸出圆环外，圆环外缘处各有一只鸟喙向逆时针方向的鸟头，共四只，其中三只保存完整，有一只略残。圆环及十字架以及鸟头部分均有凹槽，据此分析，原应有镶嵌物，今已无存。十字架背面中部有二个铸造时留下的乳状突，从此枚十字架的形式分析，可能属于佩戴的徽章，故拟名为景教十字纹牌饰。

B105窟为一瘞埋死者的瘞窟。据学者研究，该窟除了出土铜十字架外，“还出土了纪年遗物唐开元通宝和宋嘉祐通宝、治平元宝、祥符通宝、绍圣元宝，这些出土遗物无疑是作为死者的随葬品而埋葬的。据此推测，该窟被瘞埋死者的时代在宋代。”^①铜十字架应属景教徒之遗物或随葬品。时代亦应属西夏或之前。

众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文化极为重要的标志，象征救赎罪人。据此可知，莫高窟北区发现的景教十字纹牌饰属于基督教遗物当无疑。

^①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1—45页。

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的这枚景教十字架，作为宋、西夏时期的景教遗物实属难得。虽然在中国也发现了不少景教遗物，尤以鄂尔多斯一带发现较多，但时代均为元代。姜伯勤先生指出：“在鄂尔多斯所出元代等时期青铜十字章的研究中，一直流行的看法是，认为这是与唐宋景教遗物不一定有联系的另一一些景教遗物，在敦煌，我们似乎找到了其中缺失的一环，是鄂尔多斯十字架的铜章的前行形态。”^①

彭金章认为：“由于莫高窟北区B105窟所出铜十字架为宋、西夏时期，证明西夏统治瓜沙二州及其以前，景教在敦煌仍有信仰者。‘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也透露出西夏地区有景教聂斯脱里派的信徒。’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宋、西夏时期的景教铜十字架，证明西夏时期其境内确有景教存在，尤其是敦煌，而对于这一点过去是不清楚的，有关资料显示，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发现过9—10世纪景教叙利亚—突厥语写本，‘证明黑城在五代、宋时期处于西夏统治下也存在景教徒。’”^②

敦煌地区发现的青铜十字徽章，作为一种景教艺术，显然受到了中亚风、波斯风与希腊风艺术背景的影响，它为我们研究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敦煌石窟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

敦煌莫高窟发现有两件叙利亚文《圣经》文献。一为1989年莫高窟北区B53窟考古发掘获得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另一件系敦煌民主人士任子宜先生捐献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一件叙利亚文《圣经》文献。

① 姜伯勤：《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中的景教艺术》，《艺术史研究》，第6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8页。

② 彭金章：《敦煌新发现的景教遗物——兼述藏经洞所出景教文献与画幡》，《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第53—54页。

（一）莫高窟北区考古发现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

叙利亚文《圣经·诗篇》，出土于莫高窟北区B53窟，是北区考古发掘重要成果之一，出土编号：B53：14。据《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叙利亚文文书（圣经）”记述：

残存四整页。白麻纸，纤维交织较匀，纸较厚，质较硬，折页装。

页面宽19.8厘米，页面高15.4厘米；文面宽16.0厘米，文面高10.9厘米。

文书采用西方折页式，共4页，每页从右向左横书有15行叙利亚文。第1页的叙利亚文字行间还书有16行回鹘文押头韵韵文，它的背面是第2页，第2页的左面是第3页。第3页的背面，即将文书平摊开后，第1页的右面是文书的第4页。文书使用的是从埃斯特朗哥罗（Estrangelo）字体演化而来的景教体，内容为《圣经》文选，摘录的是《旧约》中《诗篇》的内容。从文书的装帧形式和内容看，这页应是从一本与景教宗教活动有关的书中脱落的。

《东叙利亚人的每日祷告》是根据几部叙利亚文《前后书》（*Ktābā da- qdhām-w-d-bātār*）而整理出的每日祷告经文，敦煌莫高窟北区B53窟发现的叙利亚文文书刚好与该书列出的从周一到周四的唱诗（Shuray-i）内容基本相吻合。文书的叙利亚文部分用黑、红两色书写，而红色书写的有三个日期：周二、周三和周四，另外，红字标出的还有brzwg-h一词，共出现三次，分别在三组诗的开头，词的意思是“伴侣，伙伴；丈夫，妻子”，而所有红字部分都不是《诗篇》的内容^①。由此可知，此件叙利亚文文书属于Shuray-i类的诗篇节选，它是叙利亚语《前后书》的一部分，红字部分都是在文中起提示作用，这在其他

^① 段晴：《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书释读报告》（1—2），《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82—390页；《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第120—126页。

叙利亚《经文摘录》中是常见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中提到，景教僧实行“七时礼赞，大庇存亡。七日一荐，洗心反素。”《诗篇》是景教各种仪式上不可或缺的，这份文书应是景教某种仪式所选用的经文，在这些仪式上，主持仪式的神父要宣读经文，不同的教派，所选的经文有所不同，每次礼拜仪式上所选的《诗篇》也有不同。

敦煌的叙利亚写本没有具体年代，仅从字体上很难做出判断。吴其昱先生以为：“敦煌出土的这件叙利亚文残片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景教圣经之写本。”^①从所写回鹘文的书写特征看，某些字的尾部字符撇向右下方，已接近古蒙文的书写，很可能是元代时期的遗物。

甘肃在元代曾是景教比较集中的地区，敦煌曾多次迎来送往过西方的基督教徒，如马可·波罗和景教史上著名的回鹘族大主教雅八·阿罗诃三世。敦煌发现的叙利亚文《圣经·诗篇》，为研究景教的宗教仪式、神学理论以及中亚和敦煌景教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

（二）叙利亚文景教徒礼仪书残片

在莫高窟北区B53窟发现叙利亚文文献之前，敦煌研究院收藏有一件编号D.0071原名为“摩尼文经典残片”的文献。据调查得知，该文献原为敦煌民主人士任子宜先生于20世纪30至40年代任敦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教育局局长期间获得并收藏，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捐献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据1942年和1944年两次到敦煌考察的向达先生《西征小记》记载：“敦煌人藏石室写经者，大都不愿告人，唯任子宜先生于此不甚隐讳。曾观其所藏，凡见写经六卷，残片三册。……其残片大都拾自莫高窟，为之熨贴整齐，装成三册，写本刊本不一而足。汉字残片外，回鹘、西夏以及西域古文纷然并陈。”^②据此可知，上述所谓“摩尼文经典”即向达“西域古文”之一，也发现于莫高窟。由于当时该文献拾得者、匿藏者、阅览者、捐

① 吴其昱：《敦煌北窟叙利亚文课经（Lechonyary）诗篇残叶考释》，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91—233页。

② 向达：《西征小记》，《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第22—23页。

献者以及后来的收藏机构均不识叙利亚文，故误认为是“摩尼文经典”。

该文献外观似折页装。页面宽18.8厘米，页面残高11.5厘米。正背面均书写文字。正面文面宽15厘米，文面残高8.5厘米。残存文字6行。背面文面残宽15.3厘米，文面残高8.8厘米。残存文字6行。文献为白麻纸略泛黄，纤维交织较匀，纸较厚，质较硬，与前述B53窟所发现之叙利亚文《圣经·诗篇》纸质纸色相同。根据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发现叙利亚文献推测，该文献任子宜亦可能“拾”自莫高窟北区洞窟。

这件所谓“摩尼文经典”残片，经德国学者克雷恩（Wassilios Klein）与土巴奇（Jürgen Tubach）研究，认为它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叙利亚文基督教《圣经》^①。文献的撰写年代在1250—1368年之间，系元代之物。

从以上两件叙利亚文基督教《圣经》文献判断，有元一代，敦煌乃至丝绸之路沿线的河西及西北地区景教较为流行，且有寺庙，甘州就建有“十字寺”，沙州也确实有聂斯脱里派（Nestorianism）基督教教徒在活动，而且景教寺院也极有存在的可能。

四、敦煌石窟景教文献

以下简要说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景教《藏经》。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写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Pelliot Chinois）所得。编号P.3847。即今天主教弥撒中所诵《荣福经》（Gloria in excelsis），而杂以《谢恩经》（Te Deum laudamus）。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据林悟殊先生考证，《大秦景

^① W. Klein & J. Tubach, “Ein syrisch-christliches Fragment aus Dunhuang/China”, *ZDMG*144, 1(1994), pp.1-13.

H. Kaufhold: Anmerkungen zur Veröffentlichung eines syrischen Lektionarfragments, *ZDMG*146, 1 (1996), pp.49-60.

教三威蒙度赞》由三张纸粘接而成，经文“应译自叙利亚文，并认为其采用中国诗歌的韵律。”^①全卷制作于公元10—11世纪之间。

《尊经》写本。与《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为同一长卷，同一编号，即P.3847。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旅居法国的著名学者吴其昱先生在该长卷第六纸末端发现了朱文篆书“大秦寺”残印^②。《尊经》是用汉语撰写而成的，在表达形式上模仿了佛教文本。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尊经》之后有一“按语”，就是所谓的P.3847全卷的第三部分。该“按语”之所以书写于《尊经》内容之后，显然是针对《尊经》所敬礼的诸经目而写。《尊经》写作时代当与《景教三威蒙度赞》相同，撰写于公元10—11世纪之间。

《志玄安乐经》写本。原为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收藏。日本学者羽田亨博士对《志玄安乐经》全文著录并考释认为，“此经有如敦煌出土的诸多经卷一样，写于黄麻纸上，上下和行间施以细栏。首行与第一百五十九行，即末行，如前所述，题有志玄安乐经，首尾完结，唯始端十行下部残缺。字体异于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与之相比……近于三威蒙度赞者……书写之字体殆属晚唐时期无误。”^③写本时代为公元9—10世纪。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写本。原为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收藏，现藏日本，尚未公之于世。日本佐伯好郎先生早有研究^④。据林悟殊先生研究，《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写本的作者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同为景净。撰译时代至迟不会晚于781年^⑤。据学者研究，认为该写本与《志玄安乐经》写本的字体完全相同，两个写本应出于同一人

①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② 吴其昱：《三威蒙度赞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3分，1986年，第411—438页。

③ [日]羽田亨：《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に就いて》，《东洋学报》18-1，1929年，第1—24页。

④ P. Y. Saeki, "The Da-ch'in Luminous Religion Sutra on the Origin of Origins", *Bulleting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No. 9, 1934, pp.133-135; P.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Academy of Oriental Culture*, 1937.

⑤ 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第185页。

之手。写本时代同为公元9—10世纪。

《一神论卷第三》写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日本富冈谦藏于1917年购自书商。全经分三部分：《喻第二》、《一天论第一》、《世尊布施论第三》。约为贞观十六年（642）译。羽田亨博士刊有影印本并进行了研究^①。

《序听迷诗所经》。一名《移鼠迷诗诃经》，唐代汉文景教文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1922年为东京帝国大学梵文教授高楠顺次郎（Takakusu Junjirō）所得。文书亦为《大正藏·外教部》收录^②。“移鼠”为耶稣之异译，《一神论》作“翳数”。“迷诗所”或“迷诗诃”，即景教碑与《三威蒙度赞》中之“弥施诃”，《一神论》之“弥诗诃”，《至元辨伪录》卷三作“弥失诃”，谓“迭屑人（即基督教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作“弥尸诃”。今译“默西亚”或“弥赛亚”，意为救世主（Messiah）。约成于贞观九至十二年（635—638）之间^③。

粟特-突厥文书札。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所得。编号Or.8212: 86。现藏英国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据哈密顿（J. Hamilton）、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研究，该文献时代属于9—10世纪，即属于归义军时期^④。

粟特文基督教占卜书。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所得。编号Or.8212: 182。现藏英国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年代待考。

其他有关汉文、回鹘文和藏文文献中亦遗存有基督教的信息。

① [日]羽田亨编：《一神论卷第三 序听迷诗所经一卷》，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昭和六年（1931）影印本。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4，No.2143，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出版，第1286—1288页。

③ [日]羽田亨：《景教经典序听迷诗所经》，《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京都：弘文堂书房，大正十五年（1926），第117—148页。

④ H N. Sims-Williams and J. Hamilton,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 siecle de Touenhouang* (London: SOAS Publications, 1990), pp.51-52.

如汉文文献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所见“甘州波斯僧”、S.6551V《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中的“波斯佛”，应是景教士。还有《历代法宝记》、《老子化胡经卷二》文献S.516、P.2125、Φ.261、P.3727所见“弥师诃”，P.3727“弥师何”，P.2776“弥沙河”、“弥沙师诃”；S.6963V所见“弥施诃”之名，即为被佛道贬斥为“外道”之景教。又如回鹘文文献Or.8212：120“isxaq”，P.2988V、P.2909V“Yoxnan”等，回鹘人名“isxaq（伊斯哈克）”、“Yoxnan（约翰）”亦为基督徒之常用名。再如藏文文献Pt.1182、Pt.1676绘有十字架图形，Pt.351《占卜书》叙载有一段有关景教的记述^①。

此外，被视作出自敦煌藏经洞的景教文献还有“小岛文书”《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两个写本。但其真实性自20世纪上半叶现世以来就备受学者们的质疑。林悟殊、荣新江等先生有考证^②。

五、敦煌石窟碑碣遗物“教士”、“长老”题记

敦煌研究院藏元至正八年（1348）《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至正十一年（1351）《重修皇庆寺记》亦留有基督教流播的印记。两碑皆为晋宁路绛州白台寺僧守朗所立。《重修皇庆寺记》著录之晋宁路施主列有“费教士”题名。“教士”乃基督教传教士之称谓。蒙元笃信释教，但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皆尊重。元直隶中书省晋宁路与沙州路相距甚远，为何立于莫高窟前之《重修皇庆寺记》见有晋宁路施主“费教士”？李永宁先生认为，“可能是因立碑者守朗和尚前为晋宁路绛州白台寺僧，客居沙州之晋宁路旧识，应守朗之请共施财帛以积功

① 王兰平：《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39—45页。

② 林悟殊、荣新江：《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第19—34页。

德。”^①

《重修皇庆寺记》所见沙州施主名列尚有“长老桑哥失里”、“义束”，并《莫高窟六字真言碣》见有“长老米々”、“义束”。上云“义束”，应是“耶稣”之谐音，而“长老”、“义束”均为基督教所使用之称谓^②。

敦煌莫出土景教文献从唐一直延续到元代，大体符合景教传入我国和存续的基本时代脉络。它们是敦煌作为丝绸之路“华戎所交一都会”的体现，并为元代敦煌流行基督宗教留下历史遗迹。

①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15页。

② 王兰平：《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第51页。